



三百年江山 十二帝兴替 成败兴废弹指间

大清皇帝正说

上册



(台湾) 高阳



大清皇帝正说

上册

(台湾) 高阳◎著

版权图字：01—2004—62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清皇帝正说 / 高阳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4. 12
(高阳系列)

ISBN 7-80130-948-0

I. 大... II. 高... III. 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2567 号

高阳作品集
大清皇帝正说

著 者: 高 阳

责任编辑: 韩金英

特约编辑: 王 英

版式设计: 领读工作室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 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65244792 65126372 (编辑部)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邮 箱: unitypub@tjpress.net

65228880@tjpress.net (投稿) 65133603@tjpress.net (购书)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730 毫米 × 970 毫米 1/16

印 张: 50.5

字 数: 808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30-948-0 / I · 63

定 价: 69.80 元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代序：半壶酒一春秋

——高阳其人其事其作

谈及高阳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力，有人曾这样形容：有水井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

高阳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旧式文人”，他学富才高，著书百种，嗜酒如命。常自嘲：酒子书妻，即以酒为子，以书为妻。

清末有“三屠”，张之洞用财如水，人称“屠财”，袁世凯好行杀戮，时称“屠民”，岑春煊性好勘人，称为“屠官”。对于清史独钟的高阳，以善“屠纸”予以自谓。

高阳的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总印数已经超过2000万册，“有村镇处有高阳”之说名不虚传。

何怀硕说“高阳是奇人。在这个旧文化崩析、新秩序未立的混乱年代，他兼有旧学与新慧”。

台湾作家张大春说“高阳的成就独一无二，甚至难以找到继承人”。

台湾著名小说家王文兴说“高阳是国宝级人物”。

台湾诗人痖弦称高阳为“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历史小说第一人”。

高阳本名许晏骅，字雁水，笔名郡望、吏鱼，出生于钱塘望族。许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曾有人担任兵部尚书、内阁学士之类的官职。高阳童年所居住的祖屋，门口就悬挂着由嘉庆皇帝亲笔所题的“榜眼及第”、“传胪”等匾额，在花厅中也高悬着慈禧太后亲笔书写的“福寿龙虎”世匾。高

阳的父亲许宝朴曾任浙江财政司官员。母亲黄婉同是出身富贵的大家闺秀，不仅饱读诗书，更能将正史、野史转述为一个精彩的小故事。因此，幼年时代紧随于母亲身旁的高阳，自然而然地聆听了许多官场现形以及乡野传奇，无形中，母亲也成了高阳文史修养的启蒙之师！

有十个兄弟姐妹的高阳，在家排行老九。

高阳大学未毕业，就以优异成绩入杭州笕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当了空军军官。1948年随军赴台湾。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退伍后任台湾《中华日报》主编，还一度出任《中央日报》特约主笔。高阳擅长于史实考据，曾以“野翰林”自道。他的成就不仅在于评史述史，更重要是将其史学知识用于创作历史小说。

高阳的创作以清代宫廷与近现代高层人物生活为主，高阳对历史小说的贡献，最主要的在于他“以考证入小说，以小说成考证”，开创了中国历史小说的新类型。

高阳读书不记笔记，但却有着超凡的记忆力，对中国历代皇帝的生卒年月日、民族、籍贯、三亲六眷、兴趣爱好都了然于心，对于帝王们手下的文臣武将、宰相诸侯，以及嫔妃太监、心腹与政敌，也无不熟稔，朋友们便戏称他为“皇帝老儿家的总管家”。更重要的是，高阳对于皇室权力斗争、朝廷政治风云、官闱秘闻、以及牵一发动全身，由此带来的对于整个中国的各种影响，无不津津乐道，了如指掌，堪称“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了。

1962年，高阳受邀联合报副刊连载《李娃》，这部作品不但一鸣惊人，也成了高阳历史小说创作的滥觞，而后发表的《慈禧全传》及胡雪岩三部曲《胡雪岩》、《红顶商人》、《灯火楼台》，更确立了他当代首席历史小说家的地位。

高阳一生著作共有90余部，约105册。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情节跌宕，旨在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界全出。

高阳幼承家学，其后自学有成，再加上此前已累积了多年现代小说的创作经验，因而一步入历史小说的领域，立刻创造出引领风骚的局面。由

于其先祖在清朝世代为官，來台后因而能为小说灌注浓厚的历史感，其创作理念对后来者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高阳的小说以史料繁细、运用从容有余见长，就作者的取材角度及材料与小说的对应关系观察，高阳作品的材料来源的确十分广泛，几乎囊括了历史研究的全部范围。小说的某些段落对史料的依赖极深，具有利用小说展现史料的企图，一些看来不起眼的细节也有史料为依据，高阳的小说被称许为“庶几乎史”并非没有原因。

高阳这种写作风格的形成与高阳历史学者的自我定位有很大关系。高阳具有强烈的考据癖，考证与小说互相影响，愈到创作后期二者的结合愈趋紧密。

高阳对历代王朝兴衰得失的关键，有独到的见解。他总结了三条法则：一是历史的重心在经济，经济的重心在交通；二是任何朝代都有中心势力，此一中心势力如为高级知识分子，必开一代之感运，三是一个王朝，亦如自然人之有生老病死，但在生老的过程中，休养生息，培养人才，就会出现中兴的局面。

这个“中心势力”的提法则可以用来说明高阳作品中关于官闱斗争、政治风云的叙写特别细腻曲折的原因。虽然高阳极为注重他的考证成果，但对读者而言，小说中的历史成分与人情法则可能才是阅读乐趣所在。

高阳的作品不仅具有历史百科全书的内涵，同时也是人情世故的百科全书，高阳的小说之所以能影响、流传如此之广，本身有其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

一是因为作者以独到的眼光钜细靡遗地挖掘了包含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史料，这些史料在古今的对照下毋须夸张点染，天然具有奇趣；二是对人情、世故、智谋的深研熟玩，有意用来建筑小说的戏剧性；三是小说中的人生态度符合今日大众的需求，与旧式观点产生了隔膜，因而能广为大众所接受。

高阳的历史小说中写了不少爱情故事，他写出了爱情的真与美，又通过爱情，写出了女人心机的缜密、应变的灵动、意志的果敢、生命的韧性。

高阳小说至今仍风靡的原因，正如林青在《高阳传》中指出的：“时下，田园风光的乡材原野早被日趋扩大的都市所蚕食、所吞噬，太多的是急小功近么利者，大面积的伐树木、采山石、排污水，为了追求生活的舒适与享受，而破坏了大自然的古朴与野趣，人们再也无需也无从张扬原始的天性。另一方面，立交、地铁、别墅、霓虹、电视、饮料，人们饱尝轻松自乐，人们的感官在体验粗犷与雄浑上都显得十分退化了，再往何处去体会撼天动地的悲剧意识和人文精神？”

“高阳历史小说的走俏，也是当代人为自己的软绵绵而又急切浮躁的生活与心态补充精神上的钙和盐。”

责任编辑 / 韩金英

目 录

代序：半壶酒一春秋 / 高阳其人其事其作	001
01 皇帝的种种	001
02 爱新觉罗的祖先	023
03 太祖、太宗	027
04 世祖	084
05 圣祖	115
06 世宗	223
07 高宗	269
08 仁宗	409
09 宣宗	450
10 文宗	474
11 穆宗	510
12 溥宗	644
后记	791
附录一：高阳大事年表	794
附录二：高阳作品表	796

01 皇帝的种种

清朝自康熙年间发生夺嫡的纠纷以后，不建储位，成为定制，从而又建立了立贤不立长的制度。因此，每一个皇子，都可能是未来的皇帝；也因此，皇帝的种种，须从出生写起。

关于妃嫔召幸，有好些有趣而不经的传说：既属不经，虽然有趣，我亦不便介绍。不过，皇后及有封号的妃嫔，各有固定的住所；皇帝某日宿于某处，或召某妃嫔至某处共度良宵，作为太监最高办事机构的“敬事房”必然“记档”，因而当妃嫔发觉怀孕时，可以查得受孕的日期。

妃嫔一证实怀了孕，自有太医院的御医定期“请喜脉”，服安胎药；到得将次足月时，内务府就要“传妇差”了。首先是选“奶口”；其次是找稳婆，都由“上三旗包衣”的妻子中选取。

出生以后，由敬事房通知内务府记入“玉牒”。所谓“玉牒”者，即是皇室的家谱，爱新觉罗氏大体为两类：凡是太祖的子孙称“家室”；太祖兄弟的子孙称“觉罗”。腰带分黄、红两种，所以俗称家室为“黄带子”，觉罗为“红带子”。玉牒的封面，亦如其色，家室是黄色封面，觉罗是红色封面，不妨称之为黄簿、红簿。

皇子皇女当然记入黄簿，主要内容是性别、生母名氏、位号、第几胎、出生年月日时，还有收生稳婆的姓氏，以便出纠纷时，可以追查。

然后是命名，时间早晚不一，有些出生未几，即行夭折，既无名氏，亦未收入玉牒叙排行的，在康熙年间是常有之事。命名之制，至康熙皇长子胤禔出生，始有明文规定，上一字用“胤”，下一字用“示”字旁，由内阁选定偏僻之字，奏请硃笔圈定。需用偏僻字者，因为此皇子将来可能成为皇帝，便于臣民避讳。自康熙朝以后，命名字派如下：

- 一、雍正：上“胤”、下“示”字旁。
- 二、乾隆：上“弘”、下“日”字旁。
- 三、嘉庆：上“颙”、下“玉”字旁。
- 四、道光：上“绵”、下“竖心”旁。
- 五、咸丰：上“奕”、下“言”字旁。
- 六、同治：上“载”、下“三点水”旁。

七、光绪：同上。

八、宣统：上“溥”、下“人”字旁。

至道光以后，有一不成文的规定，非帝系命名下一字，不用特定的偏旁。由此可知庆王奕劻之子载振与同治、光绪为兄弟，但不同祖，溥儒与溥仪为兄弟，且皆为道光的曾孙——我请读者注意皇室的制度，就因为细节上亦能显示若干情况，自有助对清皇帝的深入了解。皇子到六岁开始上学。读书之处名为“上书房”，在乾清门右面，书房很大，除皇子外，近支亲郡王之子，亦在此上学。上书房设“总师傅”一人，特简翰林出身的大学士或尚书充任；“师傅”若干人，亦非翰林不得任此差。入学时，皇子向师傅一揖，师傅立受。

除读汉文以外，皇子尚需学习“清书”，又称“国语”，即是满洲语文；教清书及骑射的都是满员，称为“谕达”或“俺答”，皆为满洲话的音译。满洲人管西席叫“教书匠”，所以对谕达的礼数远不及对师傅。不过教骑射特简一二品满员为“压马大臣”，等于谕达的首脑，主要的职司是负责习骑射时的安全措施。

清朝对皇子教育，颇为看重；除特派近支亲贵“稽查上书房”以外，皇帝万岁之暇，亦常至上书房巡视，或出题考课，有奖有罚。所以清朝的皇子，一旦接奉大统，都能亲裁奏折。而尽心启迪的师傅，遇到得意门生而为天子，不但一世尊荣，而且会荫及子孙。因为皇帝为报答师门，对受业师傅的子孙，每每特加青睞。

由此可知，在上书房当师傅，必然希望自己的学生是皇位的继承者；甚至为学生设计，取得皇位。如杜受田之与咸丰，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

道光末年，杜受田入值上书房，皇子受学者文宗行四，悼王行五，恭王为六，醇王行七。文宗居长，且为孝全成皇后所出，大位有归，自不待言；但文宗兄弟中，资质以皇六子奕訢为最佳，亦最得宣宗钟爱；因而不断在考虑，是否应该改变初衷，传位于奕訢？

这种意向，渐渐外露，文宗颇以为忧。有一年四月间，宣宗携诸皇子行围——打猎，驾出前夕，杜受田问文宗：“四阿哥明天扈从行围，应有所自见？”

文宗答说：“是的。所以我最近勤练火器。”火器就是洋枪。

“四阿哥错了！只该立马静观，端枪不动。”

“请问师傅，这有说法吗？”

“自然。”

杜受田秘密教导了一番，文宗心领神会，欣然称谢。及至到了围场，他如师傅之教，只静静看诸弟，追奔逐北，将一管枪平放在马鞍上，始终不动。



“你怎么不下手？”宣宗奇怪地问。

“回阿玛的话，时值初夏，百兽蕃育，獐兔怀孕的很多，打死了有伤天和。而且，儿子亦不愿跟弟弟们在这上头争一日之短长。”

宣宗一听这话，认为他有人君之度，立即打消了“易储”的念头；大为夸奖，说他是“仁人之心”，又说他“友爱”。凡此反应，都是杜受田预期一定会发生的效果。

文宗对杜受田的恩礼，亦可谓至矣尽矣。他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即位之初，即有上谕，杜受田赏加太子太保銜；杜父杜翻原任礼部侍郎，年逾八旬，赏头品顶带，太子太保銜；杜受田三月由左都御史兼署吏部尚书；五月调刑部尚书；七月加二级。咸丰元年五月升协办大学士管理礼部事务。

于此，我要顺便介绍“入阁拜相”的制度。清朝的内阁，至嘉道以后，形成定制，四大学士两协办，大致满汉各半。由尚书一升协办，即为“入阁拜相”；称谓与大学士相同，名为“中堂”。但协办升大学士容易；而尚书升协办较难，道理很简单，大学士缺多，协办缺少。通常在尚书这个阶段，回翔盘旋，总须十年八年之久，到得调任吏部尚书，方取得升协办大学士的资格。杜受田于道光二十四年由户部侍郎升左都，同年十二月升工部尚书，其间因故“夺俸二年”，不计年资；至咸丰元年五月升协办，实际年资不足五年，且由刑尚晋升，皆非寻常。

咸丰二年四月，杜受田奉命偕恭王的老丈人福州将军桂良处理江苏、山东水灾以后的河工、漕运等事宜，殁于清江浦；文宗震悼，硃批遗疏云：“忆昔在书斋，日承清诲，铭切五中。自前岁禀承大宝，方冀赞让帷幄，说论常闻，詎料永无晤对之期。十七年情怀，付于逝水；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遣词用字，别具深情；至于恤典之优隆，远轶常规。以协办照大学士例赐恤，自不足为奇；入祀贤良祠，亦不算例外，赠太师、谥文正，则非同等闲。更有一事，在汉大臣可谓异数，即灵柩准入京城治丧。

杜受田是山东滨州人，其时因义军之乱，迎养老父，住在京师，所以杜受田灵柩须移京治丧。过去遇有此种情况，都是在城外找寺院停灵开吊；从无灵柩入京城之例。至于谥文正，上谕谓援嘉庆年间大学士朱珪之例；朱珪亦为帝师，当和珅用事时，仁宗亦颇受威胁，朱珪多方卫护，情事与杜受田相类。但经朱、杜二人创下例子，以后凡为帝师，皆有谥文正的可能，李鸿藻以为同治启蒙，得谥文正，犹有可说；至孙家鼐亦谥文正，则末世名器必滥，不足为贵。

当杜受田病殁时，杜翻年近九旬，犹住京邸；文宗为这位“太老师”设想，亦无微不至。当时杜受田长子杜翰，方任湖北学政，应该由在京的次子杜堉至清江浦

迎灵，顾念杜堉需在京侍奉祖父，特命杜翰扶柩回京。对杜堉则赏加礼部尚书衔，以为慰藉，其后更赏食全俸。杜受田的三个孙子，均钦赐举人，准予一体会试。杜翰在道光二十九年以检讨放湖北学政，本是宣宗对杜受田的酬庸；及至丁忧服阙、补官升官的经历，在有清一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首先，以检讨放学政，便是异数。学政为“差使”，三年差满，回京复命，应该仍回本职。杜翰道光二十九年放湖北学政，当咸丰二年七月丁忧，亦正是差满之时。但丁忧守制，照例二十七个月方为“服阙”，而杜翰只守了一年的制，是由于其时义军起义，以“墨经从军”之例，如曾国藩便依此例“夺情”，奉旨领团练赴湘北攻打义军。杜翰于咸丰三年十一月补右春坊右庶子，这是早在杜受田病歿，恩诏中便许下的诺言。自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跃而为正五品詹事府的庶子，不止连升三级，是连升五级。

照正常的升迁程序，就算一帆风顺，毫无顿挫，自检讨至庶子，至少越过了从六品赞善，正六品中允，从五品洗马道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起码要十年的工夫。

翰林为清贵之职，如果始终为文学侍从之臣，则自庶吉士“留馆”，二甲授职编修，三甲授职检讨，至正二品的内阁学士，内转侍郎，外放巡抚，可决其必将大用。在翰林院的官职上，除状元特授“修撰”为正六品以外，编检皆为七品；再上面便是从四品的“侍读”、“侍讲”，七品何能一升便到四品？是故编检至相当年资，一定要出翰林院，其出路有三：一是外放知府；二是转“科道”成为言官，三仍是翰林，但必须转至詹事府。

詹事府为东宫官属，清朝自康熙以后，既不立储，詹事府便成赘疣；而所以保存者，即是为了翰林升迁，必须有此人事上的管道之故。

詹事府下设左右春坊，其职属有左右赞善；再上左右中允，再上左右庶子，庶子之上，便是詹事府的“堂官”，称为正詹事、少詹事，简称正詹，少詹。

赞善、中允都是六品，正合编检升任，因此编检出翰林院，而仍任清秘之职，称为“开坊”。当翰林“留馆”，“开坊”是两大关，但开坊以后，升至从五品的詹事府司经局洗马，又是一大关；因为洗马应升的官职为五品左右庶子，通政使参议，光禄寺少卿等，照吏部的则例，竞争者极多，而洗马往往落空。故有“一洗凡马万古空”之号；而翰林一当到庶子，则出路甚宽，熬到这一地步，亦有一句成语形容，名为“九转丹成”；转者吏部授官“六班”中的“转班”之“转”。翰林开坊，由右转左；升一级再由右转左，如此转来转去，转够了年资，自然脱颖而出，故名为“九转丹成”。



京官一到五品，便具有“京堂”资格。“堂”者“堂官”，现在的说法便是“首长”。京中各部院的官员，通归为两类：一类是“堂官”，包括正副首长在内，如各部满汉尚书、左右侍郎共六人，即称为“满汉六堂”；以下郎中、员外、主事等，通称为“司官”。因六部皆分司之故。

“京堂”虽可作“京官中的堂官”解释；但仅限于三品至五品，亦即“六部九卿”的“九卿”，如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通政使、詹事府、国子监等等衙门的堂官。至于二品、三品的京官，又特成一个阶级，称为“卿贰”，卿是指大理寺正卿等三品京堂；贰是侍郎。位至卿贰，即意味着即将进入政治上的领导阶层了。

杜翰只当了一个月的右春坊右庶子，官符如火，又升迁了；而且这一升比由检讨升右庶子更为惊人，一跃而为卿贰，是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同时被派了三个差使，一是“办理巡防事宜”；二是“稽查中书科事务”；三是“文渊阁直阁”。第三个差使，使他成为内阁的实际负责人，因为协办大学士必在部，或在军机，不到内阁，大学士多在家颐养，无事不到内阁。内阁日常事务，多由“直阁”的内阁学士处理。

又不久，正式补为工部侍郎，同时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际遇之隆，升迁之速，无与伦比；文宗之报答师恩，真可令人感动。但亦害了杜翰：牵涉在“辛酉政变”中，差点送掉性命。

辛酉政变的主角，一方面是慈禧、恭王及军机章京曹毓瑛等，一方面是肃顺、端华、载垣等所谓“三凶”及军机大臣。结果“三凶”被逮赐死，军机大臣穆荫、杜翰、焦佑瀛被罪，穆、焦二人充军，杜翰的罪名，本与穆、焦相同，“发往新疆致力赎罪”，亦因看在“杜师傅”的分上，“特谕革职，免其发遣”。

皇子在学期间，到了十六、七岁便可“当差”了，通常是派“御前行走”，学习政事。及至成年封爵；在结婚时自立门户，称为“分府”。

清朝除“三藩”以外，异姓不王，所以凡封王必为皇子、皇孙。其爵四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惟一的例外是“国戚”，大多为蒙古科尔沁旗的博尔济吉特氏。这自然是有怀柔的作用在内的。

所谓“国戚”，是指公主夫家及太后、皇后的父亲及同胞兄弟而言；此外只算“椒房贵戚”而非国戚。因此乾隆孝贤皇后的内侄、大学士傅恒之子福康安封贝子，乃成异数。福康安“身被十三异数”，别有缘故；以后谈高宗时会提到，此处不赘。

亲王、郡王又分两种，一种是“世袭罔替”，一人封王，子子孙孙皆王，这就

是“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一种是“降封”，父为亲王，子为郡王，孙为贝勒，一代不如一代，直到“奉国将军”为止。

同是皇子，何人该封亲王，何人该封郡王，何人该封贝勒，贝子？大致决定于下列四个条件：

一、出身：所谓出身指其生母而言。世宗动辄谓皇八子胤禩“出身微贱”；同胞手足，何有此语？即因胤禩的生母良妃卫氏，来自“辛者库”。这个名词是满洲话的音译，实即明朝的“洗衣局”，专门收容旗籍重犯的眷属，操持打扫灌园等等贱役。因为如此，胤禩在康熙时只封贝子，反而是雍正夺位之初，封此“出身微贱”的弟弟为廉亲王。

按：清朝的宫闱之制，皇后以下，有皇贵妃、贵妃、嫔、贵人等等；大致生母为妃，而非由宫女逐渐晋升者，生子皆有封王的希望。

出身是主要条件，此外：才干、爱憎、年龄是三个附带条件，配合是否得宜，决定封爵的高低。

成年的皇子一旦封爵，即须“分府”。分府先须“赐第”，或则旧府改用，或则新建。王府除了“世袭罔替”者外，一旦降封，必须缴回；由宗人府咨商工部，另拨适当官屋，以供迁住。原来的王府，即指拨为新封的亲、郡王府，其规制皆有一定，不得逾越。

除了府第以外，分府时总要置办家具、陈设，需要一大笔款子，因此在分府时，须特赐一笔“钱程”。在康熙时定例是二十三万银子，怡亲王胤祥在康熙朝未领过这笔款，因此，我判断胤祥根本未曾受封，亦就未曾分府——圣祖崩逝时，胤祥方圈禁在宗人府，怡亲王乃雍正所封。

皇子年长学成，为朝廷办事，大致可分为两种性质、四大类别。会典规定，可派皇子充任的职差为一种性质，非定制而出于特命为又一种性质。前者除少数特例外，一般而言，无足重轻；后者则可看出皇帝的意向，并大致可以测定其前途。

四大类别是：

一、恭代祭祀：中国的传统讲究礼治，一年到头，祀典不断。祀典分大祀、中祀、小祀，自明世宗更定后，相沿勿替，只有小幅度的修正。大祀应该亲祀，但以种种缘故，不克躬行，照会典规定，可特命亲郡王恭代。此是例行故事，无甚意义可言；但冬至南郊祭天，自雍正以后，格外重视，奉派恭代的皇子，被视为大命有归的暗示。

二、临时差遣：遇到某种情况，必须表示重视其事，或形式上应由皇帝亲裁时，



临时差遣皇子办理。如赐祭大臣，常派皇子带领侍卫，前往奠酒，即为一例。派出皇子的身份，常视被赐祭的对象而定，如杜受田灵柩到京，特派恭亲王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酒，足以显示对杜受田的恩礼特隆。

三、分担政务：康熙以前，原则上不使亲贵干政，皇八子胤禩曾一度奉派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则以胤禩特具事务长才，而内务府大臣只是管皇室的“家务”，与参国家机要者不同。

雍正得位，信任怡亲王胤祥、庄亲王胤禄，则以兄弟阋墙，非在骨肉中结党不足以残骨肉。及至乾隆即位，起初正如雍正之作风，但深知重用亲贵，一则有尾大不掉之危；再则有彻底纵容之害，所以约束王子，不使与闻政事。嘉道亦大致如此，及至咸丰即位，因洪杨势炽，且恭王确有才具，一度使之掌军机。由此成例，而亲贵执政，弊多于利，已成定论，清朝之亡，未始不由此。

四、寄以专阍：清初亲贵从征，立功大小，决定爵位高低，亲属关系的远近，只于领兵多少有关系；兵多将众而不能克敌致果，只会受罚，不会被奖。因此，派出大将军寄以专阍，就理论而言是予以一个立功的机会，亦可说是一种考验。既能通过考验，又立了功劳，则选此人继承皇位，为理所当然之事。康熙在夺嫡纠纷以后，绝对禁止皇子结党争立；而晚年任皇十四子为大将军，用意在此。

谈到皇子成为皇帝，不能不先谈“大行皇帝”。皇帝驾崩，在未有尊谥、庙号以前，为别于“今上”，概称“大行皇帝”；皇太后、皇后亦然。中国的皇帝，暴崩的很多，或者由“不豫”至“大渐”，亦即起病至临危，往往只有两三天功夫。夷考其故，皇帝玉食万方，营养过剩；加以起居及医药上的照料，至少是十分周到，所以诸如肺结核等等慢性病，极少发生；而高血压、心脏病则为恒见，这两种病，夺命皆速。所谓“暴崩”不是脑溢血，便是心肌梗塞；清朝有好几个皇帝，即死于这两种病。

世宗可能顾虑到这种情况，仓促之间，口噤不能言，无由下达“末命”，岂非又起骨肉萧墙之祸？因此证明了一个皇位继承问题的特殊处理办法，亲自书写继承人之名，藏于乾清宫最高之处，即世祖御书“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另有一小银盒，内中亦书同样的殊谕，出巡时由贴身太监随身携带，以备变出不测时，仍能确知大位谁属。

一般而言，至大渐时，召继位皇子及顾命大臣至御榻前，口宣末命；驾崩后，继位的皇子既未登基，更无年号，而且天下臣民还不知道宫中“出大事”，但根据“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法则，既有遗命，不必柩前即位，即已自动成为嗣皇帝。顾

命大臣，其他皇子以及宫眷、太监等，行大礼、改称呼，作为事实上承认皇帝的表示。

嗣皇帝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处理大行皇帝的遗体。清朝皇帝经常“住园”，夏天则至热河“避暑山庄”避暑，即在宫内，自雍正以后亦住养心殿，不住乾清宫。主要的原因是，以满洲“祭于寝”的习俗，皇后所住的坤宁宫，经过改建，地下埋了两口大铁锅，每天后半夜煮两头猪祭神，中宫变成“沙锅居”，何能再住？

所以除大婚合卺之夕，一住坤宁宫东暖阁，以应故事之外，皇后从不住坤宁宫，这一来，皇帝亦就不住乾清宫了。

但乾清宫毕竟是皇帝的正寝，所以不管康熙崩于畅春园，雍正崩于圆明园，乾隆崩于养性殿，嘉庆、咸丰崩于避暑山庄，道光、同治崩于养心殿，光绪崩于瀛台，皆奉遗体于乾清宫，在此大殓或行正式祭礼。

第二件要做的事，是遵奉遗命遵嫡母及生母为皇太后，再以奉太后懿旨的名义，以嫡福晋亦即所谓“元妃”为皇后。在此期间，处分重大事件，对外辄用“奉遗命”的字样，有关宫闱则用“奉懿旨”的字样。

接下来是颁遗诏又称“哀诏”，然后钦天监择日在太和殿行即位礼，礼毕颁“恩诏”，布告天下，新皇帝已经正式产生。

称为“恩诏”者，因为嗣君即位，与民更始，大赦天下，“非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所谓“常赦不原”即“十恶不赦”。此外耆龄百姓，及孤苦无依者，赐帛赐米，亦有规定，总之加恩中外，所以称为“恩诏”。

恩诏中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必须说明，即是定年号：新君的年号，照例由明年起算，而且非正式即位以后，不能颁年号。文宗崩于热河，穆宗未奉梓宫回京行即位礼，即有用新年号的“祺祥通宝”的“样钱”出现，为此，李莼客颇致讥评，殊不知此为别有经济上的理由之从权措施。以后会谈到，此处不赘。

年号起于汉武帝，但历代帝皇似乎全未考虑到历史记载的方便。动辄改元，甚至一年之中，一改再改；直到明朝，始画一为一帝一年号而仍有例外：一是英宗，年号先为“正统”，复辟后改为“天顺”。二是光宗，万历四十八年秋即位，一月即崩，熹宗接位定明年年号为“天启”，如是，则光宗竟无年号，因定即位之日起至年底为止，为“泰昌元年”。一年三帝两年号，在正统的皇朝为一罕见的现象。但清朝的年号，自入关开始，一帝一号，始终正常。

年号关乎“正朔”，等于御名的别称，自应较常人命名，格外慎重；或出亲裁、或由军机大臣及南书房翰林拟呈圈定，皆几经斟酌，决不会不通不妥，闹出宋太祖用伪号“乾德”的笑话。其原则大致如下：



一、避免使用前朝末代年号的字眼，如“崇”与“祚”。

二、声音响亮，决无拗口之弊。

三、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深入浅出，令天下臣民共晓的涵义。自顺治以后，年号的涵义如下：

（一）、顺治——入关之初，天下未定；愿将顺民意，以求大治。此一年号显然有抚慰的用意在內。

（二）、康熙——天下既定，与民休息，希望安居乐业。

（三）、雍正——雍为雍亲王，正为正位。特选此两字，正见得其得位不正；世宗喜自作聪明，类此弄巧成拙之事甚多。

（四）、乾隆——乾卦在五伦中，象征为男、父、君；用于年号自是指君。乾隆者“乾运兴隆”，可见高宗得位的基础是很薄弱的。此年号配合其他各种迹象，透露了许多秘密。

（五）、嘉庆——此年号为高宗内禅时所定，嘉是对嗣皇帝的嘉许，嘉勉，庆者高宗自祝。

（六）、道光——光大道统之意。清朝诸帝年号，道光的涵义，比较空泛。

（七）、咸丰——道光年间，积极整顿盐务、漕运、河道，但鸦片战争的结果，显示财用不足，国势中衰；文宗即位，以求富足为第一要义，因称咸丰。

（八）、同治——穆宗年号，本定“祺祥”，辛酉政变，“三凶”被逮，两宫垂帘，恭王执政，同治的涵义非常明显：太后临朝听制，并不专断，愿与亲贵大臣，共同治国。

（九）、光绪——绪有二义，一为统绪，二为次绪。张衡《东京赋》：“故宗绪中圯”，注曰：“绪、统也”。所以年号用此绪字，既以表示德宗为外藩迎立，亦以表示兄弟终弟及的先后次绪。于德宗的身份，异常贴切，同光之际，词臣最盛，故能选用此精当深刻的字眼。光自是光大之意。

（十）、宣统——迎立溥仪的懿旨，明白宣告，溥仪入继为穆宗之子，兼祧德宗。此是根据慈禧的意旨，明白宣告统绪，用意亦在防止醇王一系，或者会引明世宗的故事，以皇帝“本生父”的身份，在宗法上引起争议。

在年号之外，御名应如何避讳，亦是在即位之初，即须明白规定的一件大事，否则民间无所遵循，会发生触犯“大不敬”严重罪名的可能。

清太祖名努尔哈赤，太宗名皇太极，世祖名福临，都是满洲语的译音，既未以汉文命名，自不发生避讳的问题。又自文宗开始上一字不必避讳；而至德宗以后，